

当代经济前沿文库

FRONTIER SERIES IN CONTEMPORARY ECONOMICS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失业、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武献华 庞明川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当代经济前沿文库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 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武献华 庞明川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大连

© 武献华 庞明川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 武献华, 庞明川著.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4
(当代经济前沿文库)
ISBN 7-81084-254-4

I. 中… II. ①武… ②庞… III. ①失业-问题-研究-中国 ②通货膨胀-研究-中国 ③经济增长-研究-中国 IV. F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387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总编室: (0411) 4710523

营销部: (0411) 4710711

网址: <http://www.dufep.com.cn>

读者信箱: dufep@mail.dlptt.ln.cn

东北财经大学印刷厂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字数: 369 千字 印张: 12 1/8

印数: 1—2 000 册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彬

责任校对: 辛祺

封面设计: 张智波

版式设计: 丁文杰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现代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问题，而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在一国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国内学者或者致力于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或者单独地致力于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个别问题的研究。即使将失业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应用国外的模型进行验证，且结论大都是国外的模型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未能将失业与通货膨胀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因此，国内的研究缺乏将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研究成果。

本课题研究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及其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失业与通货膨胀及其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重大课题。自 20 世纪中期以来，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宏观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菲利普斯（1958）发现，在失业率与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相互替代关系；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将这一关系运用到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关系上，命名为“菲利普斯曲线”，并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费尔普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对这一关系提出质疑，认为在考虑到预期因素的情况下，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会出现移动现象，而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则是垂直的。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失业率”假说。以卢卡斯、萨金特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走得更远，甚至

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也是垂直的。后来的新古典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都对这一结论提出批评,认为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证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迄今为止,国外的研究得出的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虽然在短期可能存在相互交替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长期中就不存在了。庞明川(1999, 2000)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菲利普斯曲线的环形曲线模型,比较有效地解释了现实经济中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变动的所有情况。

第二,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也有与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共性。所谓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中国经济转轨中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不同,体现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体制转型国家的特点;其二,政府部门对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统计口径与西方国家也不尽一致,主要体现在对失业的统计上。一般认为,政府公布的失业率大大偏低,还应该包括城市和农村的隐性失业率,以及农村的失业大军。而共性则在于,无论是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失业与通货膨胀,还是西方国家的失业与通货膨胀,都是其宏观经济运行的伴生物,是市场失灵的必然结果。

第三,长期以来,已有的理论文献都是孤立地研究失业与通货膨胀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缺乏与经济增长的联系。本研究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现实,有效地将三者结合起来,并与西方国家的情形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既有各国普遍的特点又有中国特色的结论。

第四,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经济实践服务的,关于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也应该服务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本课题从对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入手,通过实证分析中国转型期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具体情况,着重探讨有效治理失业和通货膨胀、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也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目的。

基于以上的目的,本书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1章实证研究中国转型期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分别实证研究了1978—199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转型期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2章探讨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分别从历史比

较的角度对我国改革前后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情况进行比较；再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国家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进行比较研究。

第3章研究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具体分析我国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第4章着重探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在探讨菲利普斯曲线的基础之上，结合国内学者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运用笔者提出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环形曲线模型对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研究，并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国际比较。

第5章探讨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了影响中国转型期失业、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的因素。

第6章研究失业与通货膨胀治理的国际比较，重点是得出对我国治理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的启示。

第7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面临失业上升、增长下滑以及通货紧缩已经得到初步缓解的新形势下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

从研究方法上看，本问题的研究重点采用了实证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涉及到比如数理分析、对策研究等具体方法。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取决于对于课题内容的高度把握，都服从于问题研究的需要。

当然，对于本问题的研究，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因为对于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样一个涉及面广、涵盖内容多的极为宏观的课题来说，尽管我们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仍显得粗浅和薄弱。但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著者
2003年3月

本书由

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目 录

第 1 章 中国转型期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态势	1
1.1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1978—1998 年	1
1.2 转型期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8
1.3 转型期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30
第 2 章 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35
2.1 历史比较：转轨前后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35
2.2 国际比较：主要国家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41
第 3 章 中国转型期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	56
3.1 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56
3.2 中国的经济周期	65
3.3 转型期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周期	74
第 4 章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86
4.1 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概述	86
4.2 中国的菲利普斯曲线	94
4.3 菲利普斯曲线的国际比较	115
第 5 章 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121
5.1 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121
5.2 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分析	131
5.3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162
第 6 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治理的比较研究	217
6.1 失业治理的国际比较	217

6.2 通货膨胀治理的国际比较	249
第7章 中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287
7.1 转型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证分析	288
7.2 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比较	343
7.3 中国转型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363
主要参考文献	377

第 1 章 中国转型期失业、通货膨胀 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态势

1.1

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1978—1998 年

在 1978 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背景下，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由指令性计划所决定，导致价格信号扭曲，资源配置失衡；虽然实行的是“充分就业”制度，并在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成功地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过高的失业问题，但这是以大量的隐性失业为代价的，且经过 29 年的发展和累积，1978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仍高达 5.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开始。经过 20 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基本上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失业率也由 1978、1979 年改革初期的 5.3%、5.4% 降到了 3% 左右。1979—1998 年，年均 GDP 增长速度为 9.4%，保持了近 20 年的世界领先水平，为同期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由改革初期的 3 624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 1998 年的 78 017 亿元，增长了接近 22 倍；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379 元人民币增加到 1998 年的 6 392 元，增长了近 17 倍；如果用购买力平价（PPP）来计算，以美元数值表示的中国人均

国民收入更高。^①

1.1.1 体制转型的阶段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②

第一阶段(1979—1984年):在计划体制外围(农户经济、个体经济)进行试验和探索的初步改革阶段。由于对体制转型的准备不充分,因而“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先从旧有体制中最薄弱的部分突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顺利推进,是这一时期最为突出的成就。

第二阶段(1984—1992年):由计划体制的外围部分逐步进入体制的核心部分(城市国有经济)的改革阶段。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强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在进入体制内改革阶段后,改革的难度和复杂程度都大大增加:一方面导致试点改革和局部改革,另一方面出现了增量改革和增量市场化先行的特征,进而造成新旧体制并存,双轨制同时运行。这一阶段经济市场化进程发展迅速,但基本上是以建立和发展产品市场为主。

第三阶段(1992—1997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局部的、单项的改革转向全面配套改革的阶段。市场化改革表现为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并以此带动存量资产的市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有了显著的增强。与此同时,城市化也步入了一个更快的发展阶段,并与要素市场化形成一种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

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积极促进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与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力争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阶段。

^① 比如,《中国统计年鉴》公布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939元人民币,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为2120美元,后者比前者高出6倍左右。张军:《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235~237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② 杨建文:“论中国转型期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载《上海经济研究》(第6,7期),1998。

1.1.2 改革方式与路径依赖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经济改革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进？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问题。按照正统经济学的观点，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政策必须抛弃匈牙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80 年代采取的“市场社会主义”或“计划 + 市场”的指导原则，进行彻底的、完全的自由化和市场化运动。这些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认可的政策包括：

- 迅速实行价格自由化和迅速取消政府补贴；
- 实现预算平衡并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 将国际贸易自由化，解除国家管制，迅速降低关税；
- 致力于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包括私有化运动，以使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

上述政策建议通常被冠之以“大爆炸”（big bang）的改革理论，或者被称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尽管程度不同，东欧和俄罗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实际上都采用了上述建议。但是，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激进式改革仅仅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使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暂时性地摆脱了经济衰退，对于俄罗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来说，至少可以说还笼罩在经济衰退的阴影之中。

表 1—1 中国与转轨国家的实际 GDP 增长率 (%)

国 家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年均
中 国	3.9	8.0	13.6	13.4	11.8	10.2	9.7	8.8	9.9
俄 罗 斯	—	-5.0	-14.5	-8.7	-12.6	-4.0	-2.8	0.4	-6.7
保加利亚	-9.1	-11.7	-7.3	-1.5	1.8	2.1	-10.9	-7.4	-5.5
捷 克	-0.4	-15.9	-8.5	0.6	2.7	5.9	4.1	1.2	-1.3
匈 牙 利	-3.5	-11.9	-3.1	-0.6	2.9	1.5	1.3	4.0	-1.2
波 兰	-11.6	-7.0	2.6	3.8	5.2	7.0	6.1	6.9	1.6
罗马尼亚	-5.6	-12.9	-8.8	1.5	3.9	6.9	3.9	-6.6	-2.2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1998年5月),157页。

显然，中国的体制转型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统经济学开出的“处方”，在路径选择上也没有听从世界银行、IMF 以及 OECD 等国际机构提出的建议和劝告，而选择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之路，并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这一现象被西方经济学家们称为“中国之谜”。^①

在进行路径选择时，诚如诺斯所言，依赖于每个选择的成本与收益，这是一条重要法则。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体制转型有诱致性体制创新和强制性体制创新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人们在利益驱动或利益刺激下自觉对原有体制采取的革新行为，后者是指人们在政治、军事或法律的强迫性压力下所进行的正式的体制选择过程。这两种体制选择方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成本和收益。诱致性体制创新的成本包括：在作为第一阶段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过程中的搜寻方案、机会成本、新制度安排等交易成本，和随后进行的正式制度创新安排中的为谋求全社会一致同意的谈判成本或契约成本。强制性体制创新的成本也有两类：一是实践成本，包括体制创新准备阶段的信息接收、传递和反馈费用，创新方案设计、比较和选择费用，体制过渡阶段的新旧体制异体排斥的摩擦费用，改革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或新体制不完善造成的效率损失，新体制确定过程中的法律制度费用，规范组织、行为及运行方式的费用等；二是摩擦成本，包括制定和执行改革方案时由于认识或观念上的分歧而产生的争斗，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触或反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

可以看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属于诱致性和强制性交叉的制度创新。^② 在改革初期，由于对改革包括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不充分，加之社会对改革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也相对有限，只能采取诱致性的体制创新方式，进行尝试性的局部改革，因而在创新准备期所经历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也相对较小。但是，由于渐进式改革的过程相对较长，过渡期的实践成本和摩擦成本相应地增大了。尤其是在新旧体制交替阶段，双轨制可能导致“寻租”现象增多，价格信号混乱导致企业行为扭曲，改革措施的不断更改可能造成管理部分行为失常，这些都会加大改革的

^① 比如，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等。参见：Nolan, P., 1993: "China's Post Maoist Political Economy: A Puzzle",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12.

^② 杨建文：“论中国转型期的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载《上海经济研究》，1998（6）。

总成本。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验的累积,同时也由于思想理论上和组织行为上的条件日益具备,社会承受能力的增强,就使得确定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实行全方位的制度创新成为可能。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之后,开始考虑新体制的总体设计和改革措施的全面推进与配套协调,实际上已经从诱致性体制创新过渡到了强制性体制创新阶段。

1.1.3 市场化的次序

对于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激进式改革的失败,还可以从改革的顺序方面来加以说明。拉纳和帕兹(Rana & Paz, 1994)在“过渡中的经济:亚洲的经验”^①一文中认为,中国等亚洲国家(包括老挝、越南和蒙古)所采取的“亚细亚方式”与前苏联和东欧所采取的“大爆炸”的标准方式在改革的顺序上有显著的区别:前者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先从微观入手,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制度改革等微观领域的改革先于财政、货币和外贸等宏观改革,是一种“微观优先”的改革;而后者却是以宏观领域的改革为突破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种宏观优先的改革。

拉纳和帕兹进一步认为,相对而言,亚洲的转轨经济(TEAS)与东欧和前苏联(EETSU)的转轨经济所具有的不同业绩与它们对改革的战略设计和改革的秩序有关。在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大爆炸”式的改革主要包括:快速的私有化、迅速解除对价格的控制、完全的贸易自由化。改革被认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一个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因而,改革方式的设计和改革的顺序就变得无关紧要了。相反,在中国以及随后的越南,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渐进、演进的特征,关于改革的顺序问题成为极为关键的政策选择。^②

事实上,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表明,在 1978 年开始改革时,目标是“改善”生产和供给,减轻计划体制下的“贫穷”。在农业方面,通

^① Rana, P. & Paz, W.,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the Asian Experience”, in Lee, C. & Reisen, H., eds, *From Reform to Grow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Development Centre, OECD, Paris, France, 1994.

^② 张军:《中国经济政策的回顾与分析》,241~242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取代“人民公社制”，通过逐步放开农产品价格等政策，改善了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使农业生产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平均每年增长 8% 以上。在工业方面，一方面通过“放权让利”改善国有部门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鼓励新兴部门（非国有部门）在“计划外”发展起来。在 1994 年以后，再着手进行财政改革、货币改革、外贸改革等“宏观”改革。这种“微观优先”的改革重在发展相对有效的商品市场，改善市场环境，通过改善企业的激励机制来改善生产和供给，保持经济在转型中的增长格局，它同时也因为避免了剧烈的制度和社会变革而成为社会成本较小的一种改革方式。

对于应该如何安排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麦金农（McKinnon, 1991）教授认为，第一要务是平衡中央政府的财政。为确保财政控制，首先应限制政府的直接支出，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较小的份额，之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而适当增加；其次，为确保政府支出的来源同时又不致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必须有能力对企业和家庭征收基础广泛然而又是较低的税收。在紧缩的财政控制到位，物价水平得到稳定，财政赤字被消除之后，政府就可以考虑实行市场化的第二步，即开放国内资本市场。然而，为避免出现银行恐慌和金融崩溃，放松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管制的步伐必须与政府在总体稳定宏观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适应，不能单兵突出。在国内贸易和国内金融成功地自由化以后，政府就可以按部就班地从事汇率自由化的改革。其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次序正确、步调适中的问题：先是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是经济市场化次序的最后阶段。^①

1993 年，麦金农教授在其著作的修订版中，用了一章的篇幅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次序仅在财政方面是一个重要的然而又是暂时的例外，而中国的利率政策和逐步的对外贸易改革则是与经济市场化的最优次序相一致的。^② 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在财政收入下降的同时保持实际金融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麦金农称之为“中国之谜”，并提出四点解释：（1）中国政府首

^① 罗纳德·I. 麦金农：《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中文版。

^② 同上。

先使农业领域实行市场化, 这些领域随后的生产率增长很迅速; (2) 它对工业和农业中新自由化的“非国有”部门实行了很硬的预算约束, 并给予很少的银行信贷; (3) 它仍保持对传统的软约束国有企业边际内价格的控制, 并给予强制的金融支持; (4) 它对储蓄存款确定了正的实际利率。因此, 中国具有持续时间最长, 但直到现在才得到较好证明的经济市场化经验, 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1.4 体制转型的特征——双轨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 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同时并存是最基本的经济特征之一, 即存在刘易斯 (Lewis, 1954) 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一背景下推行渐进式市场化改革, 就必然会出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 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同时并存的现象。因此,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 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最具普遍性、最自然也最独特的过渡方式便是“双轨制” (dual track system) (张军, 1997)。^① 虽然双轨制最初出现在价格改革领域, 但是,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 在许多领域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方式都具有“双轨过渡”的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一些学者把“双轨制”视为解释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变量。巴里·诺顿 (Naughton, 1994) 认为, 体制上的双轨制的存在使得中国改革后经济逐步获得了“来自计划外的增长” (growing out of plan)。他分析道,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双轨过渡特征使得原有的国家垄断有所放松, 国家垄断的放松使新兴部门获得了迅速的“进入”, 而新兴部门的进入创造了竞争, 竞争的压力反过来又必然使国有部门得到自我改善, 结果, 双轨制的存在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② 进一步地, 樊纲把这种双轨制干脆称为“体制双轨”或“所有制双轨”。他认为,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 体制双轨的最重要后果是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樊纲指出,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由于先不能触动许多既得利益, 先不对旧的体

^① 张军:《“双轨制”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改革 (1978—1992)》, 17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② Naughton, B., “Reforming Planned Economy: Is China Change?”, in Lee, c. & Reisen, H., eds, *From Reform to Growth: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ransition*, Development Centre, OECD, Paris, France, 1994.

制进行根本性改造，而是先在旧体制的外围（或“边际上”）发展新体制，因而必然出现一种“体制双轨”的局面，通过较长时期的“双轨制过渡”完成改革。^①

1.2

转型期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即是：价格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中国 20 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追求的同样是上述的四大目标。因此，从本部分开始，我们转入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至于国际收支问题，则不属于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

1.2.1 总体态势

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见表 1—2）：

第一，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保持了近 20 年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增长率。20 年间，年均 GDP 增长率为 9.4%，处于同期的工业国家的年均 GDP 增长率仅为 2.7%，发展中国家年均 GDP 增长率为 5.1%；^② 且经济增长率超过 10% 的年份有 10 年，几乎占 20 年市场化进程的半数以上；GDP 增长率在 5% 以下的年份仅有 3 年，介于 5% ~ 10% 之间的年份有 8 年。

第二，在 20 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基本上保持了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20 年来，以零售物价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年均接近 7%，且超过 10% 的年份仅有 5 年，处于 5% 以下的年份则有 10 年。

第三，在就业方面，保持了较低的失业率水平。改革 20 年来，失

^① 樊纲：“双轨制过渡——中国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成就与问题”，载《走向市场（1978—199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樊纲，张晓晶：《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44～53 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1997 年 10 月）。